

国内外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教育研究

薛怡娜

西安外国语大学 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教育成为学界关注焦点。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国内外数字素养内涵及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内涵经历从单一技术操作能力向多维度综合能力演变；国外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研究历经理论奠基、模式探索、多元化实践三阶段，呈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推进的导向特征；国内研究则以政策分析、国际经验借鉴、社会机构服务为核心视角，存在理论应用零散及实践导向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数字鸿沟

DOI:10.12417/2705-1358.26.06.070

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最显著的发展趋势之一。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1]报告预测，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预计达到20亿。基于我国国情，人口老龄化还伴随速度超全球平均水平、老龄人口基数最大、未富先老的特征^[2]。老年人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元化，其数字技能会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社会参与度和自我效能感^[3]。尤其疫情期间，在线生活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手段，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直接影响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4]。因此，研究老年人数字素养既是社会公平的关键议题，也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必然选择。

1 对数字素养内涵的研究

1.1 国内关于数字素养内涵的研究

数字素养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王晓辉（2006）^[5]首次提出“数字素养”概念。他认为，随着科技发展，掌握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技能。张薇（2006）^[6]进一步指出数字素养还涵盖网络环境下的阅读、写作及信息处理能力，强调综合性。李德刚（2012）则从媒介素养的角度提出数字素养是比传统媒介素养更综合的素养，认为数字素养还应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动态文本分析能力及创意生产和自我表达能力。

此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数字素养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王佑镁等（2013）提出数字素养是由计算机、网络、信息和媒体素养等多种素养综合而成的。施歌（2016）进一步提出，数字素养指识别、理解、批判信息的能力，并能够利用数字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其核心在于公民能够在数字化环境中运用数字化手段识别信息并解决问题。

近年来，关于数字素养内涵的研究逐渐向跨学科发展。包雅君等（2020）从媒介、信息、技术素养维度进行解析，指出数字素养涉及信息的获取与处理、媒介的批判性使用等多个领域。凌征强（2020）提出数字素养是指个体在数字环境中熟练运用数字技术来检索、管理信息资源，并能够批判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蒋敏娟等（2022）进一步提出数字素养应包括感知力、融通力、吸纳力、实践力和发展力五个方面。

国内关于数字素养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技能到多维度能力体系的逐步发展。最初定义多聚焦于技术操作和信息处理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们逐步认识到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体系。

1.2 国外关于数字素养内涵的研究

Paul Gilster 1997年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提出“数字素养”概念，并定义为“能够获取、理解、整合并且有效利用数字信息的能力”。他强调数字素养不仅包括使用计算机和数字工具能力，更包括对信息的批判性思考和综合运用能力。这一观点为后续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Shetzer & Warschauer（2000）认为除使用数字信息，数字素养还包括建构文本、声音、图像等数字信息的能力。2004年，以色列学者 Yoram Eshet-Alkalai 提出了更综合的框架，强调数字素养不仅包括基础的计算机操作技能，还涉及到更广泛的如图像素养、超媒体素养、社交情感素养等能力。他的观点将数字素养拓展到多维度的能力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此后，数字素养的概念进一步细化。Tabusum 等（2014）提出数字素养指个体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整合、解读、审视、分析的能力，既包括对计算机知识的掌握，还包括应用数字技术进行创造。Walton（2016）进一步指出数字素养

是利用信息技术，发现、评估、共享和创建内容的能力。

除学术界，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也对数字素养概念进行了界定。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在2011年将数字素养定义为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全球范围内数字化信息的检索、理解、评估、创造和交流的能力。欧盟（European Union, EU）（2013）认为数字素养是满足个人、社会和专业领域信息需求的能力，涵盖工作、就业、学习、休闲等多个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数字素养视为计算机、媒介和信息的结合，是运用数字技术，安全地获取、管理、知悉、整合、交流、评估及创造信息的能力。

2 对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研究

2.1 国内关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已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要将数字素养提升作为全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同年12月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1]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列为优先行动之首，强调帮扶老年人这一信息弱势群体。2022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将“广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列为五大发展目标之一。

国内关于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一是基于国际经验的借鉴视角，通过对国际案例的分析提出我国应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建议。例如，刘晓倩等（2024）分析了新西兰政府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策略，认为跨部门协作的政府主导模式对我国有参考意义。商宪丽等（2024）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Tech Savvy Seniors计划为例并总结其成功经验，表明这些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曾粤亮等（2024年）则探讨新加坡在信息素养培养中的前瞻性政策，强调了政府的关键作用。

二是基于图书馆等社会机构提供服务的研究视角。商宪丽（2023）采用网络调研和分析法，明确公共图书馆在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中的核心地位。卜淼（2023）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调研法，分析了新加坡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在服务 and 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方面的对策。牛玲捷（2024）从政策保障和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活动两个方面梳理了公共图书馆的政策保障与活动模式，并提出通过创新活动、分级服务和多方协作的对策。

三是基于政策分析的研究视角。随着国家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关注，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政策的实际效果与实施路径。

金燕等（2023）采用量化分析法研究我国老年人数字包容政策文本，探究其在不同维度上的特点与不足。曾粤亮等（2023）构建了“政策工具—数字鸿沟—行动者”分析模型，并提出了基于量化结果的优化建议。

2.2 国外关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老年人数字素养已成为全球研究的重点议题之一。因此研究逐渐从数字素养的理论探讨转向了老年群体在数字技能提升方面的实践与模式探索。

（1）理论奠基与初步探索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关于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研究逐渐进入学术视野，各国政府开始关注数字鸿沟问题。

这一阶段数字素养作为一个概念逐渐明确。Gilster（1997）^[2]提出的“数字素养是能在多种数字环境中获取、理解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数字素养不仅是技术能力的体现，更是对数字信息的批判性理解和有效利用的能力。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推进，研究者对数字素养的定义也逐渐丰富，除了技术层面的能力外，还涵盖了信息检索、信息处理、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多方面的素养。

（2）研究深化与模式探索阶段

进入21世纪，各国开始关注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教育的实践实施，通过教育培训帮助老年群体适应数字社会。

2001年，新西兰在《积极老龄化战略》中提出通过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技能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在实践层面，美国政府率先开展了一系列数字素养项目。2012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推出了“Connect 2 Compete”计划，通过提供低成本的互联网接入设备以及免费数字素养培训，帮助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等群体减少因经济条件造成的数字鸿沟。新加坡在这一时期也推出了多个数字素养项目，尤其是在“智慧国”计划的框架下，为老年群体提供了包括电子政务服务、网上购物及基础网络安全教育在内的数字技能培训。同时，社区图书馆也发挥了关键作用。201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通过其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成立数字素养工作小组。通过与教育机构的合作，ALA推出了“DigitalLearn.org”平台，提供针对老年群体的免费在线课程，帮助其掌握基础的数字技能。

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形成了初步的教育模式，为后续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3）多元化发展与应用实践阶段

201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发力，通过多种数字素养教育项目为老年群体提供了更加灵活的

学习路径。

各国政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1年,澳大利亚政府启动了“数字中心”(Digital Hub)计划,通过建立数字培训中心为老年群体提供免费的数字技能培训。新加坡数字办公室于2020年招募了上千名数字大使,分布在图书馆、超市等老年人常去的场所,提供即时的技术帮助。这一模式成功推动了老年群体在数字化生活中的融入。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老年人能够通过这些项目进行线上购物、远程医疗等服务,极大提升了其生活质量。此外,新西兰政府在2021年推出了老年群体数字素养评估框架,旨在提高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培训的有效性。该框架通过评估机制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了解老年群体在数字环境中的需求与挑战,并为全球范围内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参考。除政府主导的项目,社会组织和非政府机构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英国的慈善机构Age UK长期招募与培训“数字冠军”(Digital Champions),通过面对

面的指导为老年人提供技术支持,帮助老年群体克服对新技术的恐惧。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老年群体数字素养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的重点。国外更多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机构合作为老年群体提供数字技术培训。国外各类项目也侧重强调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技术操作,还需要提高其在数字环境中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国外研究逐渐从数字技能层面扩展到社会适应层面,关注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中的社会参与和个人发展需求,注重多维度支持以消除数字鸿沟。相比之下,国内研究更多集中于理论探讨,通过多学科视角分析老年群体数字素养问题,从宏观角度提出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建议。与国外实践导向的研究相比,国内研究在理论应用方面仍显零散。现有成果更多聚焦于老年人数字素养需求的识别和优势的挖掘,缺乏系统化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人民数据.人民数据研究分析:怎样解决老年人数字沉迷和手机依赖难题[EB/OL].(2024-09-05).
- [2] 蔡昉:《中国老龄化挑战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视角》,载《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期,第27-34页.
- [3] 武文颖,朱金德.弥合数字鸿沟: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困境与突围[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44(01):162-169+213.
- [4] 杜鹏,韩文婷.互联网与老年生活:挑战与机遇[J].人口研究,2021,45(03):3-16.
- [5] 王晓辉.革命与冲突—教育信息化的教育学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06,(2).
- [6] 张薇.英语数字素养的研究型评价模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02):115-121+161.